

插紅旗 拔白旗 开展全省翻身运动



辽宁人民出版社

插紅旗 拔白旗
开展全省翻身运动

☆

辽宁人民出版社編印、出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宮前里2号）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文出字第1号
沈阳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 1/32 132印張·44,000字·印数：1—100,000 1958年11月第1版
1958年11月第1次印刷 統一书号：T3090·176 定价(3)0.11元

郑

目 录

中共辽宁省委召开扩大会议进行整风取得重大胜利

粉碎了以王錚为首的反党宗派活动 (1)

拔白旗 插红旗 大力支援全国 (12)

——邓小平李富春同志在中共辽宁省委和沈阳部队党委
联合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的报告摘要

巨大的胜利，深刻的教训

.....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 黄火青 (15)

以整风为纲，开展辽宁省工作的翻身运动

.....中共辽宁省委第二书记 黄欧东 (26)

插红旗，拔白旗，开展全省翻身运动

.....“辽宁日报”社论 (34)

农业要翻身必须大搞共产主义教育运动

.....“辽宁日报”社论 (40)

× × ×

切除工会组织中的一个毒瘤

.....“辽宁日报”社论 (46)

服从党的领导 坚决肃清张烈的恶劣影响

.....董雨航 金 硬 (51)

中共辽宁省委召开扩大会议 进行整风取得重大胜利

粉碎了以王錚为首的反党宗派活动

本报訊 中共辽宁省委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于十月十三日胜利结束。这次会议于六月二十四日开始，参加会议的有省委委员、候补委员四十八人，还有省委各部委、省人委各厅局、群众团体负责人，各市委、地委和县委的第一书记等，共计一百八十六人。会议于八月九日后休会九天。八月十八日复会，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会议扩大了范围，除原来参加会议者外，又有市委、地委、县委的书记、省级机关和全省主要厂矿的负责干部等参加，总计与会人数达一千零二十五人（其中列席二百二十八人）。会议历时一百零三天，张贴大字报近六千张，与会同志绝大多数在大会或小会上发了言。会议期间，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同志亲自为到会同志作了报告，对会议作了重要指示，给予到会同志极大的鼓舞。最后，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同志作了会议总结报告，省委第二书记黄欧东同志作了关于今冬明春工作的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共辽宁省委扩大会议关于以王錚为首的反党宗派活动的决议”，对反党分子王錚、宋黎、杜者蘅、李濤、張烈、吳鐸等人予以党的纪律的处分。

（一）以王錚为首的反党宗派活动是 我省工作不出色的根本原因

这次省委扩大会议，是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密切关怀下

召开的整风会议。会议通过检查对极右分子、政治野心家、坏分子張烈（原省委常委、省工会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处理，用大鸣大放、大辩论、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揭发、批判并彻底粉碎了以王錚（原省委书记）为首，包括宋黎（原省委委员、旅大市委书记兼市长）、杜者蘅（原省委书记兼省长）、李濤（原省委书记、副省长）、張烈、吳鐸（原省委常委、秘书长）等人的反党宗派活动。这是我省社会主义革命中政治思想战线上一场极为尖锐的斗争，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斗争，是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的斗争。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辽宁省的工业基础在全国是少有的，农业条件也是较好的。但是，过去辽宁工作不够出色，工业不出色，农业特别不出色，其根本原因，就是在相当长时期内，辽宁有两个省委，一个是经中央批准的以黄欧东同志为首的省委，另一个是王錚、宋黎、杜者蘅、李濤、張烈、吳鐸等人的“地下省委”，他们打白旗，闹分裂。通过这次会议，找到了辽宁省工作所以不出色的根本原因，拔掉了王錚等人的大白旗，插起了共产主义的红旗，使与会同志大大提高了共产主义觉悟，增强了党性锻炼，加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提高了党的战斗力。这是辽宁省党的建设上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胜利，是辽宁省翻身运动的开始，对全省今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将发生深远的影响。

会议上揭发出的大量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并省以来，在省委的内部，王錚、宋黎、杜者蘅、李濤、張烈、吳鐸等人，就逐渐勾结起来，进行着分裂省委、抵抗中央某些重大方针政策的反党宗派活动。他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以黄欧东同志为首的省委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的反党宗派活动，削弱了省委领导力量，降低了省委威信，腐蚀了某些干部和党员的党性，给辽宁省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王鐸等人几年来，是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着反党宗派活动。并省之初，他们由于不满中央对辽宁省委领导干部的安排，觉得自己有“才干”、有“功劳”而未被重用，就勾结起来，散布流言蜚语来破坏省委的领导威信。而当省委严肃地按照党的原则正确处理杜者蘅包庇其恶霸地主父亲问题之后，他们就更加怀恨在心，进一步施展阴谋手段来分裂党和破坏省委的团结。他们的行动一致，语言一致，打击的目标一致，对维护省委正确领导的同志百般造谣诽谤，企图孤立和挤走第一书记黄欧东同志，图谋达到篡夺省委领导权的目的。

王鐸等人有个人政治野心，为了篡夺省委领导，一方面对维护党的原则的同志极尽其造谣污蔑的能事，另一方面就利用老同学、老朋友、老同事的关系，勾结一起，进行反党宗派活动。他们之间互相吹嘘捧场，互相掩盖缺点和包庇错误。杜者蘅说：“宋黎是东北的领袖”，“王鐸有能力，有水平，有群众工作经验，就是没有经过长征，有劲使不上。”宋黎说：“王鐸是后起之秀，杜者蘅很能干。”王鐸时常渲染杜者蘅“正直坦率”、“有魄力、敢做敢为”，并誉之为“朴素唯物论者”。王鐸、李濤一致对省委严肃处理杜者蘅包庇恶霸地主父亲事件表示不满，在背后议论省委这是要“挤走杜者蘅”。李濤同王鐸密谋，自己要“一步一个脚窝”，然后从方针政策上抓省委其他领导同志的小辫子，在“要害”问题上展开攻击。今年四月省委开会时，他们兴风作浪、一唱一和，对省委展开了进攻，猖狂到极点。他们企图以此煽动起反对省委的风潮，但没有得逞。宋黎经常为反党宗派活动出谋划策，研究如何从方针政策上攻击省委的领导。他在旅大市寻找各种机会打击第一书记，诽谤和中伤市委其他领导同志，以政府来对抗市委，抬高自己，破坏市委的领导威信，企图夺取第一书记职位。他的这

种政治野心，得到了王鐸的大力支持。吳鐸对宋黎十分崇拜，言听計从。他經常攻击省委领导，无理取鬧。杜者蘅用挑撥离間的手法，恭維吳鐸“有思想，有才干”，拉他入伙，要他以秘书长身份監視第一書記行动，并說这样作“对你有好处”。他們实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对干部有門戶之見，亲疏之别，私自封官許願，制造反党势力，王鐸最善于对干部玩弄两面手法，一派伪君子态度，对自己有好感的就加以拉攏，对自己有意見的就排斥打击，因而很容易迷惑人而不易暴露出丑恶面目。

王鐸、李濤、杜者蘅支持和包庇了張烈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罪恶活动。張烈以工会为陣地，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他反对党的正确工运方針，在工会内部糾結一些品質恶劣分子形成反党集团，召开秘密會議，阴谋陷害同他坚持斗争的同志。他包庇和任用了大批反革命分子，他的生活也是极端腐化糜烂的。当張烈这些罪恶事实开始被揭露之后，王鐸即百般包庇，为張烈开脫罪責，并企图把工会党组对張烈所进行的保卫党的斗争曲解成无原則的宗派斗争。杜者蘅、李濤也从宗派观点出发，在不同場合、不同問題上，积极包庇了張烈的罪行。

他們在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中，肆无忌惮地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則，抬高自己，打击別人，要在党内称王称霸。他們不是把民主集中制了解为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而是根据他們的政治野心任意加以曲解。当他們需要抵抗中央和省委的統一领导的时候，他們就強調“民主”；当他們需要压制下級的时候，就強調“集中”。有关重大方針政策問題，他們可以不經省委集体討論而自行决定。当省委討論問題时，有利于他們的議案就容易通过，不利于他們的就百般加以阻撓，如果不同意他們的意見，他們就認為“受压

抑”，“得不到支持”，甚至以极蛮横的态度对待提出不同意见的人。省委通过的決定，他們可以不执行，說什麼“書記都說一样的話，还要那么多書記干什么”，“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們把个人凌駕組織之上，一切从个人出发，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以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来反对无产階級的集体主义，提倡分散主义，对抗党的集中統一，提倡个人独裁，反对发展党内民主。他們要求下級唯命是从，否則即給以威吓打击，說是“右派邊緣”，“要从領導崗位上撤下来”。他們喜欢受人奉承，不願听到批評，有成績就归功于自己，有缺点和錯誤就把責任推給別人，沒有任何自我批評精神。他們对来自群众的批評一概拒絕，杜者蘅在整風运动中公开宣称，对群众提出的批評，“我一条也不承認，一条也不檢討，一条也不改正。”杜者蘅不止一次地在县委書記會議上号召第一書記要独裁，提倡当“独角龍”，反对遵守集体領導的原則，反对县委对工作的全面領導。

王錚等人还恶毒地制造与散布了許多宗派主义的、破坏團結、分裂党的謠言。他們进行着和高崗一样的反党活动，却說自己是“反高崗有功”的人，誣蔑別的同志是“沾高崗边的”；他們对自己党性受到高崗影响和腐蝕，不感沉痛，不作檢查，反而自命不凡，把他們所进行的分裂党的罪恶活动說成是反高崗斗争的繼續。他們用反党的地方主义来拉攏一些觉悟不高的人，还制造了所謂“辽东与辽西”和“老旅大新旅大”的問題。几年来，他們再三地利用省委按照党的原則批評某些干部的机会，兴风作浪，挑撥离間干部的團結。他們还把党的干部分裂成“軍隊来的”和“地方的”，誣蔑曾在軍隊工作的同志“沒有群众工作經驗”，以达到破坏領導威信的目的。他們由于个人名利地位私欲不能滿足，对党的干部政策心怀不滿，仇視經過长期斗争考驗的德才兼备的領導同志，誣蔑和散布党

不重用他們。

(二) 王錚等人對抗和抵制党中央的某些重大方針政策，使我省社会主义建設事業受到嚴重損失

會議揭發，王錚、宋黎、杜者蘅、李濤、張烈等人進行反黨宗派活動還表現在對抗和抵制中央的某些重大方針政策上。

在反對党中央的工運方針上，王錚、李濤和張烈的立場觀點是一致的。張烈竭力攻擊一九五一年全總黨組擴大會議批判經濟主義、工團主義的正確性；王錚也對省工會黨組同志說：

“遼寧沒有經濟主義，沒有工團主義”，其論據是高崗時期工會沒有地位；李濤則完全支持王錚的論點，說：“東北就是有些特殊”。會議認為，高崗在東北工作期間，竭力降低黨的作用，忽視思想政治工作，因此在高崗影響下，遼寧地區並非沒有經濟主義、工團主義，相反地倒是比較普遍的。王錚、李濤、張烈以“遼寧特殊論”反對中央的正確工運方針，也正說明他們有嚴重的經濟主義和工團主義的反動思想。

對中央關於偉大肅反運動的估價和若干肅反政策的確定，王錚和宋黎都表示過懷疑和抵制。王錚懷疑第一批肅反運動成績是主要的、缺點錯誤是局部的，不願肯定遼寧省第一批肅反運動成績是主要的。宋黎對旅大市一九五五年社會鎮反運動成績是主要的，也不予肯定，並且拒不執行中央關於鎮反的某些指示。

當毛主席一九五七年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之後，杜者蘅竟然不同意在省人民代表大會中列入這項內容，以後又反對在農民群眾中廣泛進行這項宣傳教育。杜者蘅還公開反對在农村中執行党中央關於“整風生產兩不悞”的方針，並且宣揚“領導生產就是整風”的荒謬言論，實際上是取消了整風，取

消了階級鬥爭，否定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必要性。杜者蘅分管農村工作，在我省農村今年農業生產大躍進中，他沒有貫徹執行毛主席制定的農業“憲法”——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對水、肥、土、種、密加田間管理的重大方針執行不力，致使今年農業生產沒有取得革命的飛躍的成績。同時由於農村整風沒掛帥、政治沒掛帥，在杜者蘅的惡霸作風影響下，使農村某些幹部的命令主義作風有所滋長。這些都使我省農村工作受到十分嚴重的危害。

他們抵制和破壞黨的統一戰綫政策，認為統一戰綫工作是可有可無的。王錚在分管這項工作期間，從未主動過問；去年精簡機構時，竟提出取消縣委統戰部。杜者蘅一貫以大漢族主義對待少數民族問題，無視黨的統一戰綫政策。李濤對一九五六年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後中央提出的“半年不動”的指示，公開表示抗拒。宋黎一貫認為讓他分管統戰工作是看不起他。

在成都會議之後，杜者蘅公開反對中央的工農業并舉方針。今年五月，在新賓縣召開的地委、縣委書記會議上，他指責縣委執行工農業并舉方針是“兩個拳頭一起打，平分力量，齊頭并進，是原則錯誤。”他還說，發展地方工業、除四害、掃除文盲等工作都是“分散中心”，而“誰分散中心就是離心，就是右派邊緣，要從領導崗位上撤下來”。李濤不執行中央發展工業的大中小相結合的方針，只抓大的、洋的，不抓小的、土的，使我省地方工業的發展受到很大的影響。

直到這次省委擴大會議開始，王錚等人的反黨政治野心不死，還繼續進行陰謀活動。會議期間，他們實際上組成了一個以王錚為首、宋黎為軍師的“地下司令部”，指揮其他反黨分子按照統一計劃同黨作鬥爭。開始他們企圖以攻為守，抓所謂“馬鞍形”問題攻擊省委主要領導同志。這個陰謀沒有得逞，他們就轉攻為守，以極頑固的態度抗拒黨的耐心幫助和教育，

甚至訂立攻守同盟，企图頑抗到底。經過与会同志三个多月的艰苦緊張的努力，一方面对他們进行严格批判，另一方面启发教育他們放弃資产階級立場，老实交代反党錯誤，終于粉碎了他們的阴谋，促使他們向党低头，基本上承認了他們的反党罪行。

(三) 和王錚等反党宗派活动的斗争是 資产階級和无产階級的斗争在辽 宁党組織內的反映

會議指出，王錚、宋黎、杜者蘅、李濤、張烈、吳鐸等人的反党罪恶活动，并不是偶然的，有它的階級根源和社会根源。他們都出身于剝削階級家庭，都受到剝削階級思想、观点、习惯、作风的深厚影响。他們由民族革命的浪潮卷进革命队伍中来，抱着不同的动机加入了党，在参加革命和入党以后，他們很快地担負了領導工作，缺乏群众革命斗争的严格鍛炼，他們原有的濃厚的剝削階級的思想作风沒有得到根本的改造。他們連民主革命这一关也沒有过好。例如，王錚竟然為他的親屬被划为富农而进行辯护；杜者蘅在土改中竟然包庇他的恶霸地主父亲，反对群众的土改斗争；吳鐸竟完全站在封建官僚階級立場上，为他二姑打丑恶的官司，与人民法庭相对立。李濤对群众动辄綑綁辱罵，表现出十足的封建地主老爷作风。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階級斗争比民主革命更为广泛、尖銳和深刻，无产阶级和資产階級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資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成为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王錚等人既未經彻底改造思想，民主革命这一关也沒有过好，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們繼續发展資产階級个人主义，就必然墮落为資产階級在党內的代理人，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綫也就必然起而抵抗。和王錚等反党宗派活动的斗争，就是党內的两条道路的斗

爭，就是社会上无产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在辽宁省党組織內的反映。

(四) 全部必須吸取教訓，貫徹执行邓小平同志指示，开展辽宁省的翻身运动

这次會議，正如党中央所指示的，是一場大是大非的原則斗爭，是辽宁省的翻身运动。經過这次會議对反党宗派活动的徹底揭发和严肃批判，每一个与会同志都受到了一次生动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党性的教育。會議决定，要把这次斗爭的教訓当作教材，教育全省的黨員干部，在全体黨員中，实现大破大立，开展辽宁省的翻身运动，从而使我們出色地完成中央給予辽宁的大力支援全国的任务。會議指出，从这次斗爭中，應該吸取以下几点主要的經驗教訓：

第一，維護党的团結和統一，坚持和执行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結的決議，是辽宁全党的长时期的任务，永远是每个共产党员的义务。王錚等反党宗派活动的事件再一次严重地教育了我們，必須認識在我国整个过渡时期中的主要矛盾始終是資產階級同无产階級、資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間的斗爭，資產階級不甘灭亡，总是企图在我党内寻找代理人来制造分裂。我們辽宁省的每一个干部和黨員，必須严格地遵守党章党紀，切实遵守七届四中全会決議中所作的关于巩固党的团結和統一的各項規定，坚决反对任何分裂和破坏党的活动，坚决反对各种危害党的团結的言論行动，严格禁止党内一切宗派的、分裂的、阴謀的活动。今后全党同志不但要保證自己不說有害于党的团結的話，不做有害于党的团結的事，而且要向別人的危害党的团結的言行作斗爭，并且及时向党报告。只有这样，我們党才能堵塞可供反党分子利用的一切空隙，使敌人无法从内部来进行破坏。

第二，全党同志必須認真地坚决地大破資產階級个人主义，大立共产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是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对象。个人主义发展一分，党性必然降低一分。王錚等人在政治上墮落为資產階級在党內的代理人，再一次証明：一个共产党员，特別是一个党的高級干部，只要具有个人主义思想而不加以克服，就会一步步地在党内計較地位，爭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宗派活动，甚至走上帮助敌人、分裂党、破坏党的罪恶道路。辽宁全党每个同志必須深刻認識資產階級个人主义的危害，以高度的警惕来檢查和克服自己的个人主义，以求防微杜漸。惟有破个人主义，才能立共产主义。一个人能否克服个人主义，就是能否接受共产主义的标志。为社会主义而奋斗，还是为个人名誉、地位、待遇而斗争，这是无产阶级和資產階級两个立場的斗争，每个党员和干部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都必須解决这个問題。一切具有严重的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又往往同时具有严重的宗派主义和地方主义思想；以王錚为首的反党宗派活动就是这种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地方主义的結合。會議号召全体党员，要从这次斗争中深刻吸取这方面的教訓，坚决肃清資產階級个人主义及宗派主义、地方主义，反对爭名位鬧待遇、計較个人得失、驕傲自滿，使自己真正具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品質。只有全党破个人主义、立共产主义，做到共产主义思想大解放，才能使我們辽宁省的工作面貌有根本的改变，才能将中央所指示的辽宁翻身运动搞深搞透。

第三，坚决維護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党是无产阶级最高組織形式，必須保證党对各方面工作的絕對领导，坚决反对任何否定和削弱党的领导的方向，反对将自己领导的地区、单位和部門当作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組織之上，反

对不适当的过分夸大个人作用。今后必須坚决捍卫党的組織原則，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和个人負責相結合的制度，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則，特別是在企业中，要彻底肃清一长制的殘余影响，發揮企业党組織的核心领导作用。

第四，必須提高政治嗅觉，經常开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我們必須提高政治敏感，站稳无产階級立場，插紅旗，辨风向，有勇于抗歪风、頂逆流的革命精神，坚决反对温情主义、自由主义，反对对缺点錯誤不敢斗争、对真理不敢坚持的庸俗作风。

會議在听了邓小平同志和李富春同志的指示后，大家受到极大鼓舞，热烈地討論了辽宁工作为什么不出色的問題，对脱离党的統一领导、違背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以及缺乏革命精神而滿足于微小进步等傾向展开了批判。會議一致認為，这次对以王錚为首的反党宗派活动斗争的胜利，只是我省翻身运动的开始，各級党組織必須将这次會議的内容和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严肃認真地进行傳达，深入地加以貫徹执行，彻底解放思想，用不断革命的精神，再接再厉，在一切工作中进行思想上的革命、方法上的革命和技术上的革命，把各項工作、各个方面的白旗都拔掉，普遍插起紅旗来。拔白旗有两种办法，一种象王錚等人那样由別人帮助来拔掉，一种是自己拔掉，希望扛白旗的觉悟起来去自己拔掉。在工业中必須大搞群众运动，力争高速度，充分挖掘一切潜力，加强党的领导，坚决推行“两参一改三結合”的經驗；在农业方面必須加强政治挂帅，充分发动群众，在党的統一领导下，坚决貫徹农业发展綱要四十条，認真做好水、肥、土、种、密和田間管理各項工作，为明年农业生产翻一番而奋斗。通过这些措施，使辽宁的工作作的出色，生产更多的工业农业設備，創造更多的經驗，插更多的紅旗，用来支援全国的建設，完成中央給予我省的光荣任务。

（原載1953年10月31日“辽宁日报”）

拔白旗 插紅旗 大力支援全國

——邓小平李富春同志在中共辽宁
省委和沈阳部队党委联合召开
的党员干部大会上的报告摘要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同志，九月二十七日在中共辽宁省委和沈阳部队党委联合召开的党员负责干部大会上，做了极为重要的报告。

小平同志在报告中，首先对台湾海峡地区局势作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美国调集大量兵力，张牙舞爪，不能说明美国的强大，只能说明它虚弱。这吓不倒中国人民，也吓不倒世界人民，而只能促使我国人民更加团结起来，反对美国侵略。我们要教育人民，提高警惕，鼓足干劲，搞好建设，使工农业生产有更大的跃进。

小平同志在报告中着重指出，辽宁省是我国的工业基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肩负着艰巨的任务，而且这个任务一年比一年艰巨。他号召辽宁全党、全体人民出色地完成这个光荣任务。他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支援了东北，支援了辽宁。现在，东北的工业基地已经建成。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大力支援全国是责无旁贷的。摆在辽宁省人民面前的問題，不是该不该支援全国的問題，而是支援得够不够的問題。自从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辽宁省的工作是有进步的，插了一些红旗。但是，从支援全国够不够的角度来看，过去是做得不够的。你们这里大厂多，新厂多，设备好，技术力量又这么多，应该干得更出色，应该出更多的红旗，更多的经验。这样想来，劲头就会来了，就会出更多的红旗，出更多的经验。他接着指出，在一部分干部中存在骄傲自满情绪，喜欢听好话，

不喜欢講缺点；思想沒解放，还有法門寺中的賈桂式的奴隶思想；一长制的残余还没有完全肃清。他說，这些都是思想上的白旗，應該拔掉。他希望辽宁省人民解放思想，鼓足干劲，插更多的紅旗，出更多的經驗，出色地完成支援全国的任务。

关于我省的农业生产，小平同志指出，比去年是有进步的，按常規來說，可以說是有很大的进步。但是，按和全国各地大跃进的速度来比，辽宁省农业还没有革命。这里决定性的原因是，思想沒有彻底解放，沒有很好地貫徹农业发展綱要四十条。今后辽宁农业生产要实现革命，必須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路綫，把白旗拔掉，插上紅旗，这样农业就能翻身了。

他說，辽宁是大有希望的，工农业生产都能够搞得好，特别是工业。农业落后了一年也不要紧，只要鼓足干劲，也能够赶上甚至可以超过先进省。他指出，要完成辽宁所肩負的任务，关键是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貫徹群众路綫，树起紅旗，拔掉白旗。一长制是一杆白旗，它是党的领导、群众路綫的对立面。在工厂里貫徹两参一改三結合（两参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一改是改革規章制度；三結合是党的领导、技术人員和群众密切結合），就是加强党的领导，貫徹群众路綫。貫徹党中央的路綫，要发动群众大鳴大放，出大字报。总之，工农业生产，都要大鬧革命，不要只改良。

小平同志指出，工农业要革命，必須在思想革命的基础上才能办到。整风就是思想革命。他指示，一定要把整风搞深搞透，进行到底。在整风运动中，发现白旗，首先要他自己拔，如果他不覺悟，就由別人帮助拔。总之，要使辽宁二千四百万人民都动員起来，按照明确的方向，向前奋斗。

关于公社問題，小平同志指出，辽宁农村基本实现公社化在全国來說，是最早的一个省。这是好的。但是，光搭起架子来还不行。一定要有雄厚的物質基础。有了丰富的收入，群众

办公社的劲头就大了。辽宁各地要把生产搞好，使公社大大增加收入。

小平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在城市也要积极搞公社。他说，农村搞了公社，就推动城市也要搞。要很好地规划，进行试点，总结经验。要把城市的所有闲余劳动力都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这是城市办公社的物质基础。学校、工厂企业也都可以搞公社试点。

李富春同志在会上对我省工业生产作了指示。他首先指出辽宁工业基地在全国的重要性。钢铁、机械元帅的生产数量都占全国的一半。辽宁工业搞得好，对支援全国建设，对于加快全国工业化的速度，有着重要的意义。他指出：辽宁省对全国的支援，有两方面的任务：一、出工业设备，出原材料，出技术。二、出先进经验。辽宁大企业、新企业最多，而其他地方才开始建设或刚投入生产。因此，辽宁应当拿出大工业的生产先进经验，技术革命先进经验，支援全国。如果辽宁打出红旗来，红旗就可以插遍全国。富春同志列举了沈阳第一机床厂、第三机床厂、扇风机厂九月份生产大跃进的情况，说明大企业的潜力很大。富春同志指出，在八大二次会议以后，辽宁在工业上出现了一些红旗，领导上应当很好地加以总结提高，加以推广。

他指出，要搞好辽宁省的工业生产，必须进行三个革命。

第一、要搞思想革命。加强党的领导，政治挂帅，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一切大企业都必须在省、市委全面领导下，按照国家统一计划，进行生产。不这样，政治就挂不了帅。在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方面，他指出：要敢于后来居上，要打破常规，要彻底反对老大自满思想。

第二、要进行领导方法的革命。即贯彻“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群众路线，破除一长制的残余。他强调指出，必须用群众运